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

——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 “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 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 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 “中国不确定论”; 文化; 框架; 阐释

中图分类号: B 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5-0007-08

The Chines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Model”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AO Shao-xing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testifies to the theory of “China’s Model”. In light of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China Model” evidences a reality that China has been rising, while in light of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is still under the construction to seek the road to rise. Given that the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bout “China Model” is barely satisfactory, “China’s Model” needs a kind of Chinese interpretation, just as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does. Only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can the core, referring to the rise of a soft power, be touched.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s committed to mak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Model” and having the world accept it.

Key words: “China’s Model”; the rise of China; “China’s uncertainty”; culture; framework; interpretation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陶绍兴(1976-), 男, 安徽芜湖人,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哲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中国模式”的概念辨析

研究“中国模式”，需谨防无谓的词句之争。鉴于此，首先要对“中国模式”的概念予以辨析。因为把一个内涵尚未界定清楚的概念视为理论问题的解决，这远远不是理论问题的解决，它实际上还会提出问题，从而成为伪问题的源泉。中国崛起^①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

1. 问题的厘清：“中国模式”的两重定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自2004年美国资深媒体人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中国模式”概念以降，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必须明确，笼统地、不加区分地谈论“中国模式”，容易陷入文字玄谈的泥淖。分析“中国模式”，不能混淆以下两种对象：作为现实对象的“中国模式”的事实和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模式”的理念。正是由于学术界将“中国模式”的现实存在和对“中国模式”的认识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从而陷入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王绍光清楚地将“中国模式”区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客观的原形)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模型)。本体论讲客观事实；认识论讲理论总结^[2]。这样，上述争论经过转换就可以表述为：有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现在，真正的理论问题被提出来了，我们得以从混淆不清中摆脱出来。

2. 一个勿庸争辩的事实：存在着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既然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就是表征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因此，有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言而喻，研究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和发生在外国的事实比较对照。只要我们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并且系统地表达出这些事实，也就是雷默所说的“尽可能直接地集中注意可观察的事实，……坚持务实的方法并且尽可能地从事实中寻求真理，理论联系实际”^[3]。不难发现，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崛起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勿庸争辩的事实，她雄辩地证明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前哈佛大学校长、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过，“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21世纪唯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4]112}。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告诉他的女儿：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近期美国“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调查也显示：“中国崛起”位列21世纪全球十大新闻首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崛起，它完全异质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我们仅用了30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的进程。在国内面临“成长的烦恼”，30多年的快速成长也伴有就业问题、环境问题、两极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过，但是我们是以压缩的方式存在着；在国际上，我们还要承受金融资本逻辑的打压。以前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对外掠夺和移民的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而中国只

^① 丁学良认为，中国几十年来的成就，不应该称之为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再崛起，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好几个世纪里，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居于前列。丁学良. 辩论“中国模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7-108.

能在国内消化所有问题。

3. 实践问题的理论阐释：为什么要建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即中国崛起的叙事。从理论上总结“中国模式”，就是探求中国崛起之道。中国崛起为我们创造了美轮美奂的“中国故事”，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个故事予以叙述，就会面临失语的危机。“在先进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5]。因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崛起——这个崛起的过程是和平的，崛起的结果是互惠的，故而仅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还不够，必须要建构出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诚如葛兰西所言，“因为一切仅仅归结为某一件须要说明的事实要考察两次：一次作为事实，另一次作为抽象的规律，作为说明的本身”^{[6]151}。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建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显得极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和解释中国自身成功经验，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而“华盛顿共识”缺乏对社会传统的继承的想法没有关于其他国家该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建议，我认为正是这两点，中国才显得非常重要^{[7]8}。

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既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强大工具，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产物。认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的“概念像一切概念一样，从来没有直接‘存在’过，在其可见的现实中从来不能阅读出来。这个概念同一切概念一样，必须被生产出来，被建立起来”^{[8]89}。

二、戴着枷锁的拙劣之舞：“中国模式”差强人意的解读

阐释“中国模式”受到双重鼓励：一是中国持续性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尽管“中国模式”的阐释空间不断扩大，可是既有的各种理论阐释仍然显得差强人意。对“中国模式”的探索，虽然在事实方面收获

颇丰，却错失了真正的理论问题，尽管“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受到持续的关注，但是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仍然停留于初级阶段的水平上。

1. 静悄悄的变化：“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世界

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会推动世界深层次的变革，因为中国具有超大的人口规模、超广的疆域领土，所以只要中国改变了自身，也必然会改变整个世界。只不过，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前景往往被人为地低估。西方基于以下几个假设，认为“中国模式”不会改变世界，“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9]10}。细究起来，这三个关键假设都是无法立足的。首先，“中国模式”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如西方七国集团处理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G7正让位于G20），也深刻影响到世界地缘政治。其次，挖掘“中国模式”的内涵，不应只停留于她的硬件——经济发展过程，更要深入到她的软件——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特殊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定义，以至于“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坐标”^{[4]243}。再者，“当今中国的这套模式，完全不是按照逻辑设计出来的，它是一个深刻的矛盾的综合体”^{[10]38}。这个“矛盾的综合体”呈现为“中国向度”与“全球向度”的良性互动。中国模式”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被西化，失去中国特色，而是更多地保持着中国特色。肇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西方才猛然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影响。这是一种静悄悄的变化：以前是中国接受世界的改变，未来更多的会是世界接受中国的改变。

2. 澄清“中国不确定论”：误读“中国模式”的背后

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改变了世界，正

在构建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则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事先设计完毕、按照这个设计打造成形、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一个动力学(dynamics)的过程”^{[10]12}。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构建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先后经历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不确定论”的过程。

回头来看,“中国崩溃论”早就崩溃了。而“中国威胁论”更多的是一种炒作,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尽管中国和一些国家存在着一些冲突的可能性,但很多冲突是概念上的,而概念是可以制造出来的。雷默对“中国威胁论”解读值得玩味,他认为“威胁”并不表明中国要摧毁某些东西,而是目前的稳固的国际秩序会因为中国崛起而发生变化,都在朝着“中国模式”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确实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威胁”^{[7]7}。至于“中国责任论”,无非就是要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秉承实用主义的美国提出“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这说明了他们在对“中国模式”的认知中所认识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不确定论”的声音曾一度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中国不确定论”也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在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的声音。总体而言,“中国不确定论”根本上是一种误读。误读的原因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傲慢的“历史终结论”。与中国人的“必有我师”的心态相反,西方“我必为师”的心态乃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习惯于强迫别人放弃自己坚持的观点,甚至是置之绝境而后快。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悖论,即总以为为人类世界作出的贡献最大,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没有更好地理解现实。好像一俟把已知和未知混在一起,就能够生产出真理来。潜意识里还是“历史终结论”在作祟,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已经走到了人类历史的尽头。民主政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终

结论”以教条的方法日臻完善,成为超验的“信仰”,以便使自己软弱无力的主张得以立足。西方总是按照自身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总认为可以很便宜地、不付出任何艰辛的劳动就可以学到的“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11]。西方学界也作出了反思,“我们的优越感蒙蔽我们的心智”,“我们坚持用西方的多棱镜看中国,我们拒绝按它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中国。傲慢带来的是无知——我们甚至一点都不好奇”^[12]。

误读的原因之二是缺少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由于如何认知“中国模式”取决于使用何种理论框架,因此“中国不确定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在于现有的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时存在着缺陷。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异质于“华盛顿共识”的地方在于,“中国模式”意指一种分析框架。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实践回答的基础上理论定义的叙述框架。阐明“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探索进入到这个分析框架之中的可能性。雷默承认,以前用来阐明“华盛顿共识”的因特网的解释学框架无法运用于解释中国,所以中国有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不提供任何现成的清单细目式的教条,它“只是思考一种制度框架,但是90%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看起来是在寻找一种更完备的更全面的发展模式”^{[7]40}。他感叹中国的变化太快了,竟至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智力或思维的框架来思考这件事”^{[7]9}。

误读“中国模式”的深层原因在于,无视中国“文明型国家”浓厚的和平主义品性。塞缪尔·亨廷顿断言,中国崛起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之间战争的潜在根源”^{[13]186}。由于崛起后的中国没有按照西方世界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故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感到担忧,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畏惧且无法预测的力量。

三、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读懂“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而这种软实

力又溶于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中。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因为经济崛起只能说明中国现在,而文化崛起关乎中国未来。我们无法读懂“中国模式”,“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当然,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属于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因而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14]。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历了三个盛世时代,每一个盛世的可持续性都和软实力的崛起呈正相关的关系。西汉的“文景之治”是中国跨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汉书》记载,“汉言文景,美矣”,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国内一片祥和的景象。唐朝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当时,整个国家政治清明,唐太宗从谏如流、用人不疑,人文艺术空前发展。而清朝的康乾盛世,尽管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统治阶级闭关锁国、压制言论,甚至大兴文字狱,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祸根。

软实力的崛起是获得世界认同的重要因素,从世界历史上看,西方老牌殖民国家的崛起由于缺乏文化内涵,把各种国际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纯粹的金钱关系,冲突自然也就凸显出来。“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崛起则不然,“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9]188}。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现在,崛起后的中国将有机会、有实力向世界提供一条新的路径选择。

软实力的崛起表明中国经济的崛起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着军事上的崛起^①,而是伴随着一种古老文明的复兴。现在,文明已不再是西方的代名词。因为“中国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

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4]15}。这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间断性、进攻性和侵略性,丛林法则主宰一切。“在西方国家认知其他文明时,为占有生存资源而斗争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根据在这种斗争中所取得的不同成就,文明被分为发达文明和不发达文明”^[15]。由西方文明塑造的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贪婪地摄取经济利益和争夺国家霸权,忽视道德责任的构建,所以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也引发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在国际上,尽管“中国模式”已经证伪了“历史终结论”。但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世俗的壁垒,西方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话语权,总是重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调,对“中国模式”大放阙词,竭力贬损“中国模式”。他们深谙话语霸权之道,“经常不倦地重复自己的论据(改变它们的文字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效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手段”^{[6]23}。

软实力的崛起是去除“中国不确定论”的定海神针。秉持和谐世界理念的中国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中国衡量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不是征服自然的程度,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社会也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文明的基础不是扩张,而是节制,其中充满着精神文明的传统,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各方面的维护。——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限制需求”^[15]。因此,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将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坐标。与西方大国崛起不同,和平崛起后的中国对外展示的是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首先,软实力崛起的根本就是要软化对财富和霸权的追求,从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价值的问题。中国文化代表了一种价值: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开放兼容。其次,“和而不同”的理念意味着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国之上。再次,中国从来都没有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刻意谋求国家利益,因为对中国文明构成挑战的永远不会是物质财富的匮乏,而是道德的坍塌和对政权的信任基础的动

① 必须要把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崛起区别开来,中国不谋求军事崛起,军事现代化只是为了自卫。

摇。总之,“‘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4]59}。然而在国内,面对热议中的“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我们对“中国模式”的外在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反应仍然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除了传达出一些中国善意的愿景外,没有多少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对“中国模式”问题一直留踟于“捧杀”、“棒杀”的情绪层面,理性思考少。因此,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消解西方的话语霸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消除世界的疑虑。“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6]423}。要想方设法让西方了解“自己是谁”,而帮助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使命。

四、构造“中国模式”认同: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担当

文化解读为研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考量大国崛起之路,我们发现,18、19世纪英法崛起创立了古典自由主义,20世纪美国崛起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13]71}。21世纪,崛起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新型的文明或新水平的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崛起将会催生以文化强国标志的“中国模式”。“软实力的发展没必要成为一场零和游戏。中国的软实力在美国得到提升,将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反之亦然”^[16]。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1. 提升理论自觉:总结“中国模式”的本然进路

“中国模式”理论兴起的背后支撑力量植根

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理论自觉是精致地总结“中国模式”的本然进路。关于“中国模式”理论自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自觉。有一种不动脑筋的折中主义,天真地认为,无须预先批判地考察“中国模式”就可以知道“中国模式”的概念的实际内容。实际上,概念并不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尽管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概念也是一种解释,但不是科学的解释,而是曲解。如同所有的西方的概念和理论都是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取自中国的文化。欲解释和预测“中国模式”,必须将“中国模式”置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17]。移植西方概念难免会造成认知上的偏颇。如前所述,必须运用建构主义来重构“中国模式”概念,一味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概念或者仅以概念转移、概念转用为手段,都无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也根本不能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二是方法的自觉。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可以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即以“西”解我和以“马”解我。“历史终结论”是以“西”解我的典型,“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就是把理论变成一种经验的工具,总之就是把作为模式的整个认识理论直接归结为它所是的那个东西:理论实践主义的形式”^{[8]99}。西方要真正读得懂“中国模式”,必须要变革认识中国的思维方法。因为“中国模式”诞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其进一步的提升与完善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辩证的总体性观是理解“中国模式”的不二法门。

三是话语的自觉。话语的自觉,就是要坚守中国“文化主权”,牢牢掌握“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中国尚未拥有解释“中国模式”的话语。显然,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话语,解释清楚“中国模式”将是困难的。“苏东剧变”后,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拾掇“优势话语权”,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研究“中国模式”,不能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忽悠,“必须首先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本身的话语,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往往使人误入歧途”^[18]。

四是体系的自觉。“华盛顿共识”虽然在历史上起过革命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包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在中国,西方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拿着华盛顿的地图游北京,迷失方向是肯定的了。“中国模式”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故事。而“新故事”需要用新的理论体系去诠释、去总结。体系自觉必须摒弃“言必称欧美”,我们的一些学者总是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裁剪、对照中国的实践,而当西方的理论范式和中国的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习惯性地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而很少去怀疑理论本身。体系的自觉就是要超越“文化边界”,绘制出中国版的“文化版图”,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的教条,而是要研究中国模式来改写西方的教条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4]15}。当然,体系自觉也必须摒弃“言必称孔孟”,因为体系的自觉不是复古,而是复兴。

2. 增强理论自信:走出“中国模式”的实然之困

软实力如何崛起,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是关键。增强理论自信是走出“中国模式”的实然困境的关键。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源泉。“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当社会在经济上发展时,其文化通常朝着可预测的方向转变。……经济上的差别与文化上大量的、普遍的差别相联系”^[19]。中国完全可以创作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在软实力方面发挥国际影响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0]。

我们的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截取任何一个中国历史断面,都可以演绎出无数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内源性,中国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而不是次生态甚或再生态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一句话,中国文化是其他文化所无法

望其项背的。“中国模式”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又博采众长,成功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也实现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成功对接。古老文明的复兴,还融摄了全人类的理论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确立大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认可,‘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是不断产生新标准的地方,并会影响人类的未来”^[21]。

3. 实现理论自强:打造“中国模式”的应然之境

只有文化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发展的悖论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切不可只是托付于经济价值观。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及接受程度,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说,经济发展乃是一个文化过程。对于文化自强,可以作器物层次的解读。当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时,西方学者会积极地认为这是在西化。中国将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的步伐,这只是西方人的固执的体现和一厢情愿。偏于一隅的结果就是把对个别认识绝对化,从而使个别认识成为谬误。“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或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他们与我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9]82}。对于文化自强,也可以作组织层次的解读。在我国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决策后,西方学者乐观地认为,市场经济定会埋葬专制,带来民主;因为专制制度无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文化自强,更要作价值层面的解读。文化崛起的本义就是要求回答代表什么价值的问题。文化自强不是征服,而是吸引。“‘文化软实力’所塑造的不管是制度还是人,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才是有影响的。历史上,中国文化长期就是扮演这种角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贡,而且非常积极。这个社会对世界各方有很大的吸引力,核心价值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软实力”^[22]。

五、结 语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先行概念,不理解中国崛起,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指形而下的实践,而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则是指形而上的理论。由于对“中国模式”的概念予以了正确划分,我们就把握住了争论的实质:知识界赞成“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一般指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认为没有“中国模式”的,其意多半是指没有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改变了世界,而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则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如何理

解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堪称21世纪的难题。因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从来没有现成地“存在”过,必须要通过概念的生产建构出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不断地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也将会继续升温。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虽然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与时俱进”,但若不从文化角度切入,都是徒劳。因此,对于真正愿意解决“中国模式”问题的人来讲,惟一的出路在于:提升理论自觉,增强理论自信,实现理论自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崛起,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向外展示的是吸引力,而非强制力。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 [2]王绍光.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J].社会观察,2011(5):26.
- [3](美)雷默.北京共识[A]//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 [4]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5](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 [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7](美)雷默.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A]//俞可平,黄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8](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9.
- [9](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10]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
- [12](英)马丁·雅克.傲慢让西方国家忽视中国崛起[N].参考消息,2012-3-26(14).
- [1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86.
- [14](英)马丁·雅克.理解中国:西方为何错估中国数十年了[N].环球时报,2009-11-24.
- [15](俄)A·B·维诺格拉多夫.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A]//王新颖,魏海生.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2.
- [16](美)约瑟夫·奈.北京的软实力赤字[N].环球时报,2012-05-10(12).
- [17]Wang Gungwu,“Nation and Heritage,”in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isa,2003:37.
- [18]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41.
- [19](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文化与民主[A]//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34.
- [20]毛泽东.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 [21]张维为.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J].党建,2011(5):41-42.
- [22]杜维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35-39.